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张新生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科研丛书／丁科民主编）
ISBN 978－7－224－11880－3

Ⅰ．①延… Ⅱ．①张… Ⅲ．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史—研究—延安市 Ⅳ．①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650 号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

作　　者　张新生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2.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880－3
定　　价　36.00 元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科研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宽忍　刘　伟
主　编　丁科民
副主编　邓　萌　何　桑
编　委　丁科民　唐瑜君　邓　萌　何　桑　冷　梦
　　许德宝　张新生　尚飞鹏　王朝中　孙　婧

# 文化软实力的综合论证

丁科民

作为陕西唯一的省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研究机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十八大号召，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落实陕西文化强省战略的成果，组织编写的新一辑《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科研丛书》隆重出版了，这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一件喜事，也是陕西艺术科研事业的一件盛事。它的出版为整个陕西的文化艺术事业，为提高陕西文化软实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是陕西省文化厅主管的直属事业单位，现有编制51人，高级职称1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人，“三五”人才1人，“四个一批”人才1人，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人。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内设机构和研究范围由原来单一的戏曲剧目整理拓展到了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非遗保护等多个领域。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作品；完成了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13项，国家西部课题4项，文化部重点课题5项，省级课题

8项。到2012年底，全所共出版学术著作133部，约3235万字；发表学术论文2350多篇，约1300余万字；完成调研课题70多项，调研报告约500余万字，获奖成果达350多项；承办、主办、举办各类大型学术活动70多次，承担在研国家、省部级课题10个。创作秦腔、歌剧、京剧、豫剧、话剧等剧目40多台；出版美术、书法作品集30余册，展出、发表作品千余幅；出版长篇小说、纪实文学、长篇报告文学、诗集近20部。建成了300平方米的古籍陈列室；研究整理明、清、民国秦腔等10余个剧种剧目手抄本万余册；出版《陕西传统剧目汇编》近百集收录近千个剧目。

近年来，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以促进陕西社会文化发展为宗旨，以为省委、省政府文化决策服务为己任，以为陕西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为职责，紧密联系陕西实际，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大力整合科研资源，将重点转移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建设陕西文化强省伟大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实践问题上来，以艺术基础理论、文化发展战略、民族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突破口，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完成了一批地域特色鲜明、时代精神强烈、学术观点新颖、研究难度较大的国家及陕西省重点一般课题；负责申报的“西安鼓乐”项目2009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填补了陕西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白。参与主持的“秦腔艺术展”、参与建设的秦腔博物馆，得到了各方的好评。2009年，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和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单位、西安鼓乐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艺术研究所则入选申报先进单位。

这次新推出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科研丛书》，就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近年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这套丛书共包括已完成的国家课题《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陕西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陕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陕西省艺术科学重点项目《原始图腾与民间美术研究》；《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中国秦腔高层论坛论文集》《第五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西北地方戏曲发展论坛论文集》《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陕西戏曲音乐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以及《陕西文化发展探微》《秦腔问“道”》等九部著作。

审视这套丛书，既有针对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又有对陕西革命历史文化、艺术基础理论、陕西民间文化乃至西北戏曲文化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对延安红色革命文化与人文历史、社会心理、文化生态以及今天年轻人的审美需求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探究了当今历史条件下，挖掘利用整合红色革命资源的途径，为陕西红色革命文化的保护开发提供了智力支持。《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延安新秧歌与传统秧歌的关系，“鲁艺”与延安新秧歌运动、延安新秧歌的普及与发展、党和边区政府对新秧歌的重视支持、秧歌剧对秧歌这一民族文化形式的独特创造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为党在新时期内文艺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为陕西新时期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造性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参照。《陕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则站在历史与全国的视角，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构架、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对策与措施、未来发展蓝图、国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践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既有理论阐述，又有现状分析，还有发展趋势的预测，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原始图腾与民间美术研究》站在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黄河流域原始群体发源地域和部落图腾及图腾文化对传统民间美术、民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历史体系化的梳理、系统化研究，对传统民间美术经典纹饰的起源、成因、美学风格、时代特征、发展规律开展了全方位探索，回答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因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将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非遗保护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第五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西北地方戏曲发展论坛论文集》《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中国秦腔高层论坛论文集》《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陕西戏曲音乐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凝结了陕西、西北乃至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对中国戏曲渊源、生态环境、文化内涵、美学品格、人文精神、剧本创作、表演艺术、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的创新理论成果，凝结了他们对戏曲形态的多元化、中国戏曲发展趋势等问题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它们的出版将为陕西戏曲的革新、探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为陕西传统戏曲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优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陕西文化发展探微》为作者近年来在陕西文化现状与发展方面

所进行的调研与思考，展示出关注现实、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秦腔问“道”》对秦腔传统经典剧目进行了新的文化阐释，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文风，在探索传统剧目创作对当下创作的警示意义的同时，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和新的启示。

总之，新一辑《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科研丛书》，代表着陕西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凝聚着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当然也不乏睿智与理论探索的锐气和胆识。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夯实陕西文化艺术理论基础、指导陕西文化艺术实践、促进陕西文化强省建设，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艺术科学作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三大科学之一，在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在塑造国民文化人格和地区乃至国家的文化品格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的同仁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青灯黄卷，恪守学人的职业品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于陕西这座树大根深的文化资源宝库，在不断夯实文化学术基础理论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的学术人格。

如果说文艺创作是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创作过程，而且感性较强并可以一朝成名，那么理论研究则是理性较强的理论逻辑思辨过程，大多数时候默默无闻；如果说创作是一项耐得住寂寞的愚人事业，那么理论研究则更是寂寞而且清贫的愚者所为。正因为如此，我为理论家们的甘守清贫、甘于寂寞而敬佩，也为他们付出努力取得的成果而欣慰。

是为序。

# 目录

概　述 …… （ 1 ）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 …… （ 7 ）
延安文化生态的初步考察 …… （ 28 ）
延安人的“闹”
——浅议延安方言中所蕴含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 …… （ 57 ）
安塞腰鼓与紫阳民歌 …… （ 65 ）
“红色”延安与“绿色”延安（一）…… （ 76 ）
“红色”延安与“绿色”延安（二）…… （ 86 ）
有关“红色旅游”市场化的思考 …… （ 94 ）
延安纪行 …… （104）
延安日记 …… （126）

参考书目及文献 …… （190）
附　录 …… （192）
后　记 …… （196）

# 概 述

## （一）背 景

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其“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为中国延安所独有，并为国内外不少学者所瞩目。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研究多为专项研究，或为文学，或为党史，或为艺术，比如艺术方面，一些研究还停留在搜集整理的阶段。文化部前些年搞的“十大集成”多是从抢救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将许多散落在民间的各种艺术样式作品收集整理在一起。以往的研究成果都较为单一，缺乏复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正由于此，一方面，致使正在开展的“红色旅游”无法形成统筹兼顾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导致革命传统教育难以纳入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之中。为了破解这种困局，我试图从“行”和“知”两个层面入手，做一些基础性的调查和研究。据此申报了“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该课题于2006年获准立项，批准号：05IG149，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课题起止日期为2006年12月30日至2008年12月31日。

## （二）范　围

近些年来，延安给人们的印象是多重的。在党史教材中，延安被政治化了；在对外招商中，延安被经济化了；在文学作品中，延安被诗意化了；在旅游宣传中，延安又被商品化了。

在延安推出的“二黄二圣”中，就旅游市场排名来讲，首屈一指的当然是黄帝陵了。这些年来，去黄河壶口瀑布的游客也不少，而去瞻仰革命圣地、领略延安黄土风情的人则无法与前两者相比。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延安当地有关部门对延安的资源缺乏全面的把握与整体的考虑。为什么不能把“传统文化”“红色革命”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呢？人为地割裂，使得游客们只看到彼此的差别而看不到相互的联系。

延安作为新中国的摇篮、革命的圣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延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应当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

对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研究还应该找到更多的联系，如它与本土的山形地貌、风土人情、民间艺术、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当地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变迁过程等。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正是融多种学科于一体的综合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作基础，在旧的延安形象、标志、符号系统的魅力减褪之后，我们无法完成当代延安作为圣地解说的话语转换。

## （三）目的和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强调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重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并将此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总书记所谓“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当然包括延安红色革命文化。因此，深入挖掘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这一宝贵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和当代演绎，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当前文化兴国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更是加固人们精神支柱重构理想信念的根本要求。此为本课题的目的及意义之所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去延安当地考察，延安有革命旧址 351 处，珍藏文物 3 万多件；翻阅相关资料，有关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文献记载浩如烟海，采访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和故事，那更是无穷无尽。你尽可以从局部去发掘去梳理，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思考。它为你思想驰骋所提供的空间近于无限……而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又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支撑着一个价值理念：延安精神。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延安红色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使延安精神进一步得到丰富深化和发扬光大，显而易见，这涉及相关资源如何整合及怎样演绎等两方面问题。

对于所有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理应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并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科学认知。开展此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现代社会条件下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无疑是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今日研究延安红色革命文化，旨在探讨如何深化和提高我们对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得我们对之所制定实施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措施更加自觉和富有成效，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对于今日中华弥足珍贵——能够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四）方法及内容

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必须立足高远，研究视野宏阔。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自足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一般的研究者善于围绕“小系统”——学术论题本身考量对象。这样的优点是火力集中，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就事论事，造成视野褊狭的状态。要跳出视野褊狭的研究状态，非一时之功所能为之，而是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夫，要有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有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钻研。

事实上，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这个重大命题上，一向缺乏融多种学科集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没有综合性一体化的研究作基础，在旧的延安形象、标志、符号系统的魅力减褪之后，旧的话语体系过时之后，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将成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失去关联，从而无法进行有效传播，更何谈对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就“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这个课题的开展而言，如果图省事，最便捷的路子是把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局限在工具层面；如果想要触摸真正的意义，就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思考。第一步，先得充分占有资料，因为真正的研究应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对于这个课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相关背景、历史渊源、过去的民风民俗、当代的社情民意、政策背景、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与万人谈”——要征求延安当地一些官员、学者及普通百姓对于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除了深入实地考察，尽可能地占有一手资料外，我用更多的时间来翻阅图书文献。对于各种资料的甄别、梳理、比较、扬弃……动笔之时，小到行文走字，大到谋篇布局，坚持义理、考据、辞章并举。本课题拟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角度，对延安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予以全方位观照，力图向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延安”。

课题首先要对“中国革命”这个大的概念进行总体把握与比较分析，其次还要弄清它与当前开展的“红色旅游”是怎样一种关系，当代年轻人心目中的“红色”与官方现在表达的“红色”二者有多大差异？当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给他们演绎延安时期“革命洪流”的时候，当然要让他们了解“革命洪流”的历史源头……因为历史是用来求实的，逻辑是用来求是的。揭示昨天的历史真实，是为了寻求今后的发展之路。

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一文里，我尝试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延安文化生态的初步考察”。马克思说：任何民族的文化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与该民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

我采用问卷调查与随机采访，并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了解当下延安人的文化生活及精神信仰。大量鲜活的个案折射出延安地区基层农村文化生态的一些消极方面，比如，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由此，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应是发展延安“红色旅游”、振兴延安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同时，我以延安市群众艺术馆为例，调查和分析了作为文化艺术普及的基层单位和农民之间存在的供需矛盾及解决思路。

关于“延安人的‘闹’”。在接触众多的走访对象时，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上频繁出现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来弄事情，一位老农告诉我，陕北人天性喜闹。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坦然面对。这并非孤证，还比如：他们将“出生”叫作“落草”，把“死亡”叫作“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嘛，他们干脆就将之叫作“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一个“熬”字，道尽了延安人生活的艰难困苦。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坚持这个“熬”字呢？延安人祭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抑或是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的一种平衡法则……

对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如何整合，如何演绎，此文具有某种示范的意义。

关于“安塞腰鼓与紫阳民歌”。这些年来，我们已见惯了各种振兴：京剧要振兴，越剧要振兴，豫剧要振兴，晋剧要振兴。仅在陕西境内，关中要振兴秦腔，陕北要振兴信天游，陕南要振兴民歌……在这此起彼伏的各种“振兴”中，有多少“振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紫阳和安塞都是驰名全国的文化大县，而在“文化大县”这个盛名之下，我们应该诘问他们振兴民歌、振兴腰鼓的目的和用意：为谁振兴，为谁所用？这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具体到今天的民歌

和腰鼓——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将之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让外人看了炫目耀眼；还是将之作为一项普及性的文化活动，使之在当地农村广泛开展，让农民兄弟们喜闻乐见。

关于“‘红色’延安与‘绿色’延安”。我深入地探究了延安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和解释南泥湾精神，力求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垦荒造田到退耕还林，从战天斗地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红色革命”到“绿色革命”，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二者如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人们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坎坷的漫长过程。

民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本章中，我插入了从1942年至今不同时期的相关民歌，旨在反映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民意国情、社会风尚及文化特征。

事实证明：自然生态的平衡要靠科学，社会生态的平衡要靠民主。唯有科学与民主，方能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方能保证中华民族踏上复兴之路。

在“有关‘红色旅游’市场化的思考”里，我力图揭示“红色旅游”里面所包含的二律背反。

表面上，是红色革命文化同旅游结合起来，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而背后的事实则是，革命与资本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资本一旦参与其中，资本的根本属性——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或曰利润）——便会产生作用。从某种程度说，资本只会自动地为人民币服务，而不会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在“红色旅游”的大潮中，革命圣地一旦变成了以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世俗市场，她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望吗？

“延安纪行”是我屡次考察延安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想。在此文中，我试图将感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尝试用散文的笔调来写调查报告。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文本文体上的尝试，更是一种学术方式上的探索。

“延安日记”是我2005年春节之后走访延安的采访笔记与沿途感受。

#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

就“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这个课题的研究而言，如果图省事，最便捷的路子是把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局限在工具层面；但如果想要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思考。

课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延安红色革命文化，它之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革命，有着何种的继承和发展，它之于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革命，有着何种的逻辑关联。

## （一）延安红色革命文化及资源

1. 何谓红色？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红色给人的感觉为热烈、欢快、喜庆、高兴、振奋、激昂，红色让人骚动，血脉贲张。斗牛时斗牛士用一块红绸子来刺激牛，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讲，人的条件反射与牛的条件反射差不多。

在许多国家和一些民族中，红色有驱逐邪恶的功能。比如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八卦中的

离卦也象征红色。

民间常用红色来表示热闹、喜庆，比如在婚礼上和春节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

由于红色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许多警告标记都用红色的文字或图像来表示。例如在红绿灯中红色表示停止。

红色被认为能激起人体荷尔蒙的分泌，所以在运动比赛中身着红色服装者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绩。

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共产主义国家用红色来表示共产主义。

课题这里所要阐述的着重是红色的社会意义。在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色与革命如影随形，相伴而生。马克思曾强调在所有颜色中，他最喜欢的是红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将其创立的军队称为红军，将其创建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国际组织被称为“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提名叫响地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新闻机构为“红色中华通讯社”，中央政府机关报为《红色中华》，并把自己创立的工农武装称之为“红军”，革命根据地为“红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的底色均为红色。而延安当地百姓则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所有活动统称为“闹红”。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用红色来象征革命，而且用红色来表明其革命的坚定性——为了世界大同而坚持斗争不怕流血牺牲。所以，用红色来表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所有活动，既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

“红色”在本书里所指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延安时期的一些传统，以及这些传统所包含的理想信仰、政治立场和执政观念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忆及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志要把政权建立在理想信念的基础之上，把世俗之人改造成为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大公无私精神的新人。

在这里，我还想引用延安市委市政府2007年正式颁布实施的《延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的一段文字：

“红色”概念源于苏联的“红军”，后来“红色”则意指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或政治觉悟高，被广泛使用的如“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等。严格来说，全球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纪念地，应该以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来区分，巴黎公社墙及革命者的墓地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色纪念地。从广义上讲，带有政治性、教育性的纪念地，在旅游形式上极为相似，这种纪念地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国家都有分布，有的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品牌产品，此类产品可称为爱国主义旅游产品，或者历史怀旧产品，抑或“红色旅游”产品。

2. 何谓革命？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在“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中，“革命”一词共出现过194次，其本义都是“改朝换代”或“江山易主”。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19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编译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这个用法，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

而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便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他曾经

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思潮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水火不容。

1789 年 7 月中旬某日，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之时，路易十六惊慌失措地问下面："怎么样？造反了吗？'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

造反与革命，两字之差，看似语词的变幻，实则价值的反转。其实，革命也罢，造反也罢，或褒或贬，指的都是一回事。敏锐的毛泽东在"造反"后面加了个"有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为造反正了名，而且在于它通俗生动，能让中国农民们立刻就明白共产党要领导他们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确，让多数大字不识的农民理解什么是"革命"实在费事，哪有"造反有理"这么浅显易懂。从此以后，在共产党嘴里，农民造反便由逆天大罪变得名正言顺。别小看这个"名正言顺"，孔子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做到了"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

"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

孙中山当年对"革命"的定义也是"驱除鞑虏"，即推翻清人的统治，他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此语，与康有为的"保皇党"相对。因此，"革命"本义即推翻现政府，建立新政权。这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目标与口号。